

收稿日期:2022-12-22

“京娃娃”们的“救赎之地” ——读冯同庆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

张志忠

(山东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237)

摘要:《敕勒川年华》中一群北京知青到内蒙古敕勒川插队落户,自然环境与民情风俗的滋养和蒙民宽仁广德的熏陶教育,改变了他们简单、粗暴和僵化的处世方式。从理论教条和乌托邦幻境挣脱出来,回归日常生活的简单明晰,是这些“京娃娃”们的内在蜕变。经历过严峻而温馨的现实生活,他们开始踏上自我救赎之路。《敕勒川年华》置身于知青文学长河中未必醒目,但其深刻独到的历史反思耐人寻味。

关键词:冯同庆;知青文学;《敕勒川年华》;宽仁广德;自我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3)02-007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乡村叙事的本土化理论建构研究”(22AZW004)。

作者简介:张志忠(1953—),男,山西文水人,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2.024

知青文学自1970年代末问世以来,迄今已有40余年,大体有下列内容:苦难记忆,如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竹林《生活的路》;迷惘困惑、坎坷困顿,如叶辛《蹉跎岁月》;青春无悔,豪情依旧,如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感恩乡村,感恩农民,如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金牧场》;冷峻反省,苦心求索,如张抗抗《隐形伴侣》、韩少功《日夜书》。冯同庆的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1]置身于知青文学大军也许不是很醒目,不是出自专业作家之手,也没有采用常见的写作套路,不守文学创作的常规,但是开拓了新的思路,自成一格,别有天地,值得一读。

一、知青们的“忠诚证明”

司马小宁和他的北京知青同伴,人人都有不凡的身世背景,而且都学业良好,名校在读。他们告别天安门广场来到遥远的边地。司马小宁们不但成了时代的弃儿,而且还要为各自的家庭“去脱罪,去赎身”^{[1]84}。卞清怡虽然为表忠心来到敕勒川当知青,却未曾得到“赦免”,只能跨越国境到缅甸去参加缅共游击队,用更加严酷的出生入死的战争考验,“以血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和可靠性。

他们都曾过着优越的生活，但对知青上山下乡，他们非常踊跃，全身心地表现自己的革命热忱。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引发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司马小宁就和他的同学、发小们主动报名来到敕勒川即内蒙古土默川插队落户，希望在另一种环境中书写新的青春之歌。需要强调的是，司马小宁此时只有十六岁，他的同行者年纪也应该大致相仿，时代风雨使他们过早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只要有机会，他们也都是“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要在知青岁月中去做出自己的“忠诚证明”。

忠诚证明，是指人们需要用某些超常的行为，去证明自己对于某种事物的持久守望、不离不弃。“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革命需要选择，忠诚必须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在投身反抗沙皇专制的伟大斗争之前，就曾经用身体对苦痛的承受度检验自己是否可以承担革命重任。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在美丽多情的少女冬妮娅面前宣称，革命至高无上，爱情微不足道。这些作品对司马小宁们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

对一个有自觉性、有意志力、有追求目标的人，无论是事业、爱情、友谊，都需要忠诚持久，何况是革命这样的宏图大业，更需要忘我的投入，不惜痛苦与牺牲的代价。王蒙的《布礼》、张贤亮的《绿化树》，就描写了不同环境下几乎无法证明却仍然顽强证明的悖谬。《布礼》的主人公被命名为钟亦成，谐音“忠诚”，可谓用心良苦。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己的精神努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所谓“化解”，实际上也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说法，让自己相信：“虽然我钟亦成的忠诚被粗暴践踏、被无情嘲弄，我却依然还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忠诚，我的忠诚没有错。”^[2]《绿化树》中的章永璘，读马克思《资本论》时得到启悟，忏悔自己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先天遗传的血液中就“有罪”：“我重温了《初版序》，接下来读《第二版跋》直到《编者第四版序》。论证的逻辑理清了，也印证了我昨夜的想法：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这样认识，心里就好受一点，并且还有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我个人并没有错，但我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就像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命运就在这里。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3]

卡夫卡《审判》中那位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有罪即将遭受审判的K，终日惶惶不安，焦虑日甚一日，欲为自己辩护却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米兰·昆德拉的阐释是，过去是根据罪行追查罪犯，而在K这里，是“罪犯”在“寻求”“罪行”。他必须先要获知自己所犯的“罪行”，才能够进行有效的脱罪辩护，但K多方叩问却不知道自己的“罪行”何在。这就是现代的荒诞性之表征。钟亦成无法直面这样的境遇，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以加倍的努力、忏悔和救赎去证明自己的忠诚。当沉重不堪的一页历史翻篇之后，他仍然无法去怀疑和追问曾经残酷的岁月，却是用“母亲打儿子”的似是而非，去宽解自己的心头郁积。章永璘对自己的清白无罪不敢确认，不停地在进行自我检控，并且在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和资本家残暴血腥本性的批判中，发现了自己的血缘有罪，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罪犯”身份，心悦诚服地“低头认罪”。这就如同《红楼梦》中所言：“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K在被宣判为有罪之后，虽然是软弱无能之辈，但是他一直在追寻“谁之罪”，每况愈下，直到堕入万劫不复的死亡。

《敕勒川年华》中卞清怡受到牵连，恰逢内蒙古全区要掀起新的清查运动，在进行人员摸底时，卞清怡被内定为“不安分因素”。这样的危机，让卞清怡无法踏实地继续留在敕勒川，而是选择铤而走险地踏上越境之旅。这不是要逃避自己的命运，而是像钟亦成一样，用不断加码的方式去进行自己的忠诚证明。选择投身缅甸人民军去参加武装斗争，这样的选择，有着很大的被逼无奈的因素，家庭出身有“严重问题”，个人的前途发展一片茫然，但是仍然不能就此为卞清怡的选

择作出全权辩护。

“孩子们”对战争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当年的英雄故事、战争电影和打仗游戏的层面,未能看到它血腥残酷的另一副面孔。卞清怡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不屑地称之为令人神往的天国幻影。但是,她简单化地用马克思“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以加强自己对革命的选择。马克思论述暴力革命的原文是: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

马克思所论述的暴力革命是在总结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史与原始积累的关系时提出来的,它的使用,可以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相互置换,“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首先,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无论是国家强力还是革命暴力,对于历史进步,尤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次,这种作用的发挥有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在旧社会母体中业已成熟了的新社会胎胞,已经到了即将“分娩”的关口。最后,暴力并非是新旧社会交替的唯一动因。我们应当意识到一个事实: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的语境中,“暴力是助产婆”这句判断并不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普遍适用的,而必须考虑到这种判断背后所反映的国情、时代、社情的差异^[5]。当然,他们这些激进行为不是可以径直用对经典论述的“误读”加以诠释的。一方面,理论在寻找自己的接受对象,另一方面,行为在为自己寻找辩护和壮胆的言辞。还是要从人性和国民性方面去寻找内在根源。兹不赘。

二、“虽是边地,却是宽乡”

带着“忠诚证明”与“革命”的深刻烙印,“孩子们”从革命中心来到遥远的边地,一心要革命,要教育农牧民,事实却是他们被边地的农牧民所改造。这正好印证了司马小宁母亲的睿见:

“妈妈,蒙地的人,很和善吧?”

“是啊。妈妈知道那里,虽是边地,却是宽乡。”^{[1]2}

司马小宁带着母亲的临别寄语,和他的同学、朋友们走进黄河河套地区的土默川,一步步地深入参与当地人的生活,感受土默川的往事前生,开始了生命的蝉蜕之旅,更新自我,直面人生。

敕勒川为交通要津,历史悠久,蒙汉杂居,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敕勒川年华》随着司马小宁等“孩子们”来到敕勒川讲起,化繁为简,点到为止。敕勒川的劳动与生活逐渐展开,春雨润物,铺洒张扬,滋润着司马小宁们焦躁、焦虑的心灵,逐渐改变着“孩子们”的心境。虽为只言片语,散珠碎玉,在日积月累中,却凝聚起来,汇成生命与智慧的灵光。

“虽是边地,却是宽乡”,母亲没有直接说明宽乡的含义,在作品中,却经常闪现着宽乡的深厚内涵、宽仁广德,这些逐渐化解和消除了“孩子们”的狭隘、偏激与暴虐。

重要的是自然环境与民情风俗的滋养。从小接受的教育与权力崇拜,让“孩子们”视野狭隘,情感失衡,思维单一。敕勒川当地少女妮妮唱出来的歌谣,令人心胸荡然,境界大开:

长生天赐下的木草哟,无边无疆

大汗王驯养的骏骥哟，无敌无往
 敕勒人锄治的苗田哟，无秽无荒^{[1]60}

这就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那首南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形成内在的呼应。天高地广，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地缘文化的浸淫。

“春不合围，夏不搜群，这初冬季节，可以狩猎哦。”^{[1]81}

“忘了吗？在驻军驻地，看师长宰羊，连滴血都没见到，提肉都不伤骨，这个地方人与生灵，同天同地啊”。^{[1]115}

“走遍敕勒川，哪有人杀狗狗啊？杀了狗狗的人，自己就脏啦！”^{[1]115}

《大札撒》：“路人经过，礼让共席，用餐者不能拒。”^{[1]214}

狩猎要按照自然的节律，春天是百兽受孕的季节，秋天是百兽产子的节令，都不能滥杀生灵，只有冬天，才能够合理合法地进行打猎。宰杀牛羊，也有草原自己的规矩，不能见血，不伤筋骨。狗更是牧人的朋友，不能杀戮，冒犯者必有灾祸，弄脏了自己无法洗去。草原人的经典规定，接待客人有严格的礼仪，主人必须善待客人，与之分享食物，客人也不能无故拒绝。

对待狼群，蒙人也有自己的理解，在生物竞存的链条上，它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人们面对它，同样要有仁德之心。为了阻止知青们射杀狼群，蒙族师长巴特尔说：“是啊，不要随意伤害啊！非只强暴，更该仁德！看你的套马杆，杆子长长，索子环环，我们蒙人的毡帐，环环的，敕勒穹庐，环环的，环环为圆圆，做事想周全，才能做圆满。”^{[1]157}

“非只强暴，更该仁德”，这样的视点，也来自于对历史、对从这片土地上崛起的成吉思汗的阐释与理解。缺乏历史知识的赵小驹，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字面上，望文生义，认定大汗是依仗暴力征服天下的君王，巴师长却说：“她不懂，敕勒兵者，非只强暴，实乃仁德”。^{[1]142}

从巴师长和妮妮等人的口中，断断续续地拼接出大汗王和他后裔的历史轮廓：《敕勒歌》和斛律金，《青史演义》和成吉思汗，以及明初的阿勒坦汗，阿勒坦汗并非好战，他矢志要同中原通商做生意，仿照北京建立青城。这些阐述，让敕勒川的历史打通了内在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作品还增添了另一种眼光，即从边地看中原，让蒙族人讲历史，极大地拓展了《敕勒川年华》的精神气象，拓展了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宏阔视野。

宽仁广德，是面对自然万物的，更是面对人类同胞的。1930年代，敕勒川接纳过从山西逃难而来的安氏家族等灾民，还为灾民建立义学、义堂、义地。1960年代，敕勒川曾经接纳过来自甘肃的饥民，村支书郝德旺和村子里的许多男人，就是和前来逃荒的甘肃女子结婚的。妮妮的外甥顺生，则是当年从上海送到此地的三千个前来就食度灾的孤儿之一。直到这些“孩子们”顿悟，对农牧民们新增敬意：“小宁啊，要说，咱们这当年的京城游子，也算一拨流民吧，也被人家接应啦。哈哈哈，是不是？”^{[1]205}

爱护生命，常怀慈悲之心，于是相由心生，如司马小宁所言：“从云主席，到村书记，连同普通老乡，好多人都是弥勒——笑僧的模样。”^{[1]90}这一喻示，在作品中多次出现，显然是刻意经营出来，用心良苦。德旺书记在司马小宁眼中就是如此：“双目如炬，高高鼻梁，丹唇清朗，带笑的面庞，圆润光鲜，我就想起弥勒，那个笑僧，不过，他和悦中带着威严。”^{[1]75}更进一步，是看到弥勒佛像之时司马小宁的想法，他对当地人的评价更为崇高：“弥勒的面相让人似曾相识，村书记，还有一些老乡，他们当然不敢自比佛尊，可面颊显阔朗，颧骨略高广，眼帘多舒展，老乡像佛尊？佛尊似老乡？”^{[1]93}

有弥勒面相,成为司马小宁评价他人的最高尺度,他就以此称赞同为知青的张朵儿,张朵儿则将此阐释为是受到敕勒川人的耳濡目染。司马小宁在乡村颇有扎根之意,当地的领导坚决支持他返京读大学,并且告诉他,毕业后回来当公社党委书记。毕业以后会怎样,谁也说得不准,所言当公社党委书记,不过是让司马小宁可以安心去读书的借口而已:“其实,敕勒川的干部已经看明白,不该留你在这里,也可能,还是怕你水土不服,也可能不想把你耽误在这里。”^{[1]341}

三、“到蒙地,随蒙理”

尽管知青们自以为成熟,十六七岁就远赴敕勒川投身乡村的革命与建设,本地人却亲昵地称他们为“京娃娃”,既表达成年长者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也还他们未成年人的本来面目,对他们的成绩不惜高度赞扬,对他们的过失包容、原谅。是啊,怎么会和娃娃们计较高下对错呢?一群少不更事的娃娃,远离父母亲人来到遥远边地,从“孩子们”到“京娃娃”,这一称呼的变化,体现着足够丰富的蕴含和疼惜。

相较之下,无论是满脑子阶级斗争观念的赵小驹,还是自命不凡一心要改变乡村面貌的司马小宁,他们的思维和能力显然和敕勒川人不在一个层面上。一到蒙地,赵小驹就对王二杆子抽旱烟时放入的白色药片充满警觉,怀疑是毒品,便要毁掉村民种植的中草药和罌粟,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为了完成上级扩大征收粮食的任务,变本加厉地压榨村子里的存粮。在清查运动中,她不顾妮妮转达的乡人劝告的“不要掺和”,一意孤行,对所谓的“清查对象”实行身体虐待的暴力手段,导致公社副书记云贵小自杀。她仍然不肯停手,还要继续扩大清查面,株连到妮妮和同是北京知青的张朵儿。还是德旺告诉她,云贵小有着非常好的武术功夫,面对致命的暴力虐待,本来是可以抵死相拼两败俱伤,但他非常克制,不肯出手伤害对他施加迫害的知青,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对赵小驹无疑是一服难得的解毒剂,但赵小驹仍然执迷不悟。死者宽恕生者,不忍对其进行人身伤害,生者却不能够及时悔悟,何以蒙昧至此呢?于是,赵小驹用“阴谋论”的眼光看待世界,她发现无穷无尽的“敌人”,从农民为了止痛和治病种植少量罌粟,去发现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没有关系?种罌粟干什么?啊,筹集活动经费吧?你们有多少人?怎么联络?公社的云贵小,是不是元凶?是不是你们的头目?你给过他毒品吗?”^{[1]110}

司马小宁的蒙昧主要表现在他处理乡村日常事务方面,尤其是在他担任村干部之后。盲目冒失地要改变乡村的现有秩序,反对当地人的瞒产私分,挥掌怒掴富农安福锁,在带头打井中失去冷静造成严重事故,导致本地青年赵小娃脾脏破裂。面对这些差错,村民们再一次显示出他们的宽大为怀、律己恕人的高风。被司马小宁掌掴的安福锁,是个“练家子”,不至于被毛手毛脚的司马小宁打伤,反过来还担心司马小宁受到反向伤害。他还担心知青粮食不足,主动要亲友向司马小宁递话言和。司马小宁悟性高,有自省能力,也很快就觉察到自己的错误,迷途知返,及时对暴力进行反思:

书记说我吃软不吃硬,在这件事情上,我却是欺软怕硬啊!后来,离开岱村,还总是想起来,又知道这实质是人身歧视,自愧、羞煞,无地自容。^{[1]178}

赵小驹的故事以抱愧离开敕勒川而告一段落,司马小宁们则继续在当地接受“再教育”。工农民众生活在社会底层,性格坚强,意志坚定,有足够的革命决心,知识分子接受良好教育,生活条件优越,在革命性上比工农民众相去甚远。在现实中,广大知青通过上山下乡,经历文化震惊,

接受乡土中国的现实洗礼，确实是受益匪浅^①。但是，这“再教育”的思想趋势，却指向另一个方向。“孩子们”来到乡村，要全身心投入乡村的建设，却发现乡村的真实样貌。“我们去的时候，只看到学大寨，可乡亲们不认可，像扎那说的，他们‘自有办法’，不能如愿，就出工不出力，虽无力反抗，却诚如一新潮术语所言——‘反行为’。”^{[1]204}司马小宁和赵小驹惊奇地发现，当地人种了很多具有经济效益的药材，枸杞、党参等在这里长得特别好^{[1]104}。还有男人们的外出打工，以及奇石、泥煤、沙金等“庙仓经济”。

为了争取知青们的默契配合，德旺书记和村干部煞费苦心：摆出蒙族民众处理重大事务的“库伦会”的阵势，就是让村民们坐成一圈又一圈头尾相接的圆圈，用意在于显示人人均等，难以发现事情的领头人，还有一个非常切实的理由，“不想让这些北京娃娃挨饿呀”^{[1]170}。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让知青们无法公开与村民发生对抗，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村民的既定安排。这一场戏，也是《敕勒川年华》中最精彩的场景之一。

知青对农耕劳作全身心投入，他们煞费苦心地采用种田新技术，这在当地人看来，不过是冒傻气，徒劳无补，事倍功半。生产队大队长隋世元就劝告司马小宁：“你们，你们最实受，最实受啦。扑下身子种地，想高产，高产了吗？积肥呀，良种啊，打井啊……你们还，还不能一样分粮？怪可怜，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啊，不说是瞎扯闹，也差不多，弄不出什么光景！我有时候呢，想起来，怜惜你们知青娃娃哟！”^{[1]227}

“到蒙地，随蒙理”，是德旺和妮妮劝说“孩子们”的重要理由。很多在内地难以发生、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蒙族蒙地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就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如前所述，许多民谚、民歌，都在为现实做印证，“农种不孤，兼种犹多”。

对现代的精管理，就有祖训：“牧不计生灵，还有租不认地亩、捐不做谷量，这是‘胡理’，也是汉族移民该循的理数。”^{[1]206}相应的解释是：牛群羊群，天生地养，风吹草低，天然、富足，那是长生天——腾格里——的上天之意。“天恩羊群，能够少吗？如果少了，那是牧人之过！”^{[1]208}

更进一步，当地的干部群众成为了小宁和知青们的启蒙教师。扎那非常有头脑且有理性：“我们樊山岳，在淖尔营子调查过，社员都说互助组最好，地归自己种，自然就努力，不过每户体力不同，有时需要帮衬，就搞互助，比单干好，也不像小队、大队养懒人。”^{[1]137}

在固有的视界内，我们认为，中心城市条件优越，现代教育发达，具有充分的先进性，边远地区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中心城市。这是基于简单的线性的现代性观念。司马小宁们来到边地，有着足够的自信，足够的优越感，就像他们喜爱的歌曲《北京颂歌》中所描写的：“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的一颗明亮的星。”但是，边地生活消解了“京娃娃”们的简单粗暴和僵化思维，让他们从晕眩醉人的乌托邦诱惑中逐渐解脱，或迟或早地变得清醒，变得理性。可以看出，从理论教条和乌托邦幻境挣脱出来，回归日常生活的简单明晰，是这些“京娃娃”的内在蜕变。

尽管说，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并非上乘，也难以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但是，知青一代人已经普遍进入从心所欲或者耳顺之年，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作品启示我们该怎样进一步洗涤自己的灵魂，才能够拿出有质量的思想文化成果，从而无愧于曾经命运与共的同侪、无愧于曾经厚待我们的乡亲、无愧于青春蹉跎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冯同庆. 敕勒川年华[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8.

① 文化震惊，是加拿大华裔学者梁丽芳提出的命题，参见笔者所著《集体记忆，文化震惊和反省残缺：加拿大汉学家梁丽芳教授的中国知青小说研究漫评》，《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2期。

- [2] 陶东风. 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重读王蒙的《布礼》[J]. 文艺理论研究, 2014(6):156 - 163.
- [3] 张贤亮. 绿化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
- [4]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61.
- [5] 乔镜蜚,王学东. 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多重语义[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9(3):27 - 33.

The Redemption Land of Beijing Youths: A Case Study of Feng Tongqing's Novel *Years in Chilechuan*

ZHANG Zhi-zhong

(Qingdao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237, China)

Abstract: A group of educated youths left Beijing to live and settle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lechuan, Inner Mongolia.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customs nurtured them, and the Mongolian people's hospitality and forgiveness dispelled the simple, rough and rigid thinking of these youths. Their dogmatic thinking mode and utopian fantasy have given way to the simple and clear awareness of daily life, which is thei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The harsh environment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have prompted their self-redemption. This novel may not be eye-catching among its peers, but its profound and unique historical reflection is thought-provoking.

Key words: Feng Tongqing; educated youth themed literature; *Years in Chilechuan*; hospitality and forgiveness; self-redemption

〔责任编辑:王建霞〕